

张如安 著

元代宁波文学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

元代宁波文学史

张如安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代宁波文学史 / 张如安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中华学人丛书 徐传武主编)

ISBN 7-5034-1234-8

I. 元… II. 张… III. 古代 - 文学 - 研究
IV. I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616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韩淑芳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 / 32

印 张: 9.31 字数: 260 千字

印 数: 1 - 1000 册 插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34-1234-8/K·0853

定 价: 23.8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印刷厂负责退换。

目 录

概说	(1)
第一章 悲歌未彻:元代初期的宁波文坛	(4)
第一节 元初宁波的社会态势与文坛面貌	(4)
第二节 宗唐得古:戴表元诗论及其时代意义	(9)
第三节 清新雅洁的戴表元诗歌	(18)
第四节 自拓衢路的戴表元散文	(28)
第五节 刻意慕韩的任士林诗文	(37)
第六节 其他遗民作家的诗文	(44)
一、鄞县遗民诗人群落	(45)
二、奉化遗民诗人群落	(46)
三、旅甬遗民的诗文创作	(49)
第七节 张炎等词人的创作	(53)
第二章 治世之音:元代中期的宁波文学	(61)
第一节 袁桷、袁裒的诗文创作	(62)
一、俊迈高华的袁桷诗歌	(62)
二、组织瑰奇的二袁联句	(74)
三、平正宏丽的袁桷散文	(76)
第二节 理学派文学的崛起	(78)
一、诗以适性、文以明道的二程创作	(79)
二、上规元结、崇尚兴寄的黄玠诗歌	(82)

三、戛戛孤往、如其为人的岑安卿诗歌	(85)
第三节 黄潛、吴莱等的海洋旅游诗文	(90)
第三章 由正趋变:元代后期宁波诗文的嬗变	(100)
第一节 张仲深、袁士元诸家的诗歌	(100)
一、张仲深的诗歌	(100)
二、袁士元的诗歌	(107)
三、张可久的诗词	(111)
第二节 追随杨维桢、加盟玉山雅集的诗家	(113)
一、顾盟、文质、周棐	(114)
二、祖柏、僧照、福报	(118)
第三节 方国珍割据时期的宁波诗文	(121)
一、方国珍割据与在甬文人的群体分化	(121)
二、幕府文人的领袖刘仁本的诗文创作	(126)
三、诗酒应酬与续兰亭会	(131)
第四章 异域来风:少数民族作家的诗歌创作	(134)
第一节 葛逻禄迺贤的诗歌创作	(134)
第二节 元末明初的少数民族作家	(145)
一、元末的少数民族作家概述	(145)
二、元末明初的忠孝诗人丁鹤年	(150)
第五章 残阳如血:越派文学的兴起	(158)
第一节 越派文学四明分支的形成	(158)
第二节 瑞安高明和南戏《琵琶记》	(162)
第三节 慈溪乌斯道的诗文	(177)
第四节 余姚宋禧的诗歌	(188)
第五节 浦江戴良的诗文	(193)

第六章 明月藏鹭:元代宁波禅文学的兴盛	(200)
第一节 元代宁波佛教文学兴盛概述	(200)
第二节 临济禅师梵琦的诗词	(209)
第三节 宁波渡日禅僧对日本五山文学的影响	(215)
第七章 骚雅清丽:元代甬籍作家的散曲创作	(223)
第一节 “一代曲宗”张可久的散曲创作	(224)
第二节 任昱等的散曲创作	(245)
第三节 象山书会才人汤式的散曲创作	(250)
后记	(265)

概 说

元代是浙江诗歌创作的又一高峰,散文创作也有一定成就。据邓绍基主纂的《元代文学史》诗文部分统计,浙江诗文名家计 23 人,名列全国之冠,这证明元代正统诗文的重心在江浙一带;就浙江而论,以籍贯计,(大)浙东地区有诗文名家 17 人,而浙西仅有 6 家,浙东的诗文成就显然高出浙西一截。而浙东的诗文又以婺州和绍兴为盛,宁波地区所论不超过 5 人,论述也很不充分,看不出有多大特色和成就。事实上元代宁波的诗文作家连袂而出,颇见声势。自宋以来,鄞县因为文化发达,诗文作者之多在宁波地区首屈一指,据粗略统计,元代鄞县有诗文集的作者不下 40 人,别集不下 60 部,慈溪、奉化有诗文集的作家也各有 10 余家,其它各县也多有自己的文学人才。总计元代四明作家的别集不下于 100 部,平均每年至少有 1 部问世。元代宁波作家的散曲创作更是辉煌一时,张可久是公认的一代宗师。戏曲领域,高明在栎社写出的《琵琶记》蜚声全国。元代宁波在其他领域的文化成就不大,文学要算是本地域最有光采的一张“文化名片”了。但是衡量一个地方文学成就,往往不是看“平均海拔”而是看“主峰”的高度。如果给元代的宁波文学画出一条“等高线”,那么我们可以排出舒岳祥、戴表元、张炎(寓贤)、袁桷、张可久、任昱、迺贤、高明(寓贤)、戴良(寓贤)、汤式 10 位干将,相信这样的阵容,绝对可以让宁波跻身于全国文学先进之列。

根据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元代宁波诗文有两大发展线索。元初至延祐稍后,舒岳祥、王应麟——戴表元——袁桷一支活跃一时,代表了本地域文学的最高成就,他们师弟传承,文名卓著,在创

作观念上提倡宗唐得古,反理主情,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元代诗文的发展进程。袁桷之北上京师,将戴氏进步的文学理念带入北方,但也因此而中断了这一支文学在甬上的发展势头。但他们大量写作乐府歌行的风气也为后学所继承,成为宁波作家创作诗文中常用的最有生气的一种体式。另一支理学派文学有起有落,贯穿于整个元朝。大致说来,元初有史蒙卿等人之学陶,为该派之潜伏期;延祐以来该派作者蔚起,以二程、黄玠、岑安卿为代表,形成了文学群落,主宰了宁波的文坛;后至元以来,虽有袁士元等稍张赤帜,但该派声势有所回落;殆至元末,在婺州文人黄潘等的影响下,以及在慈溪赵偕心学派的自我努力下,宁波一批具有浓重理学色彩的作家相继崛起,由元中期的文学群落发展成为跨地区的越派文学集团,并对明初的文学产生不小的影响。

与元以前相比,元代宁波文学有了新的发展。首先是题材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元以前宁波诗文的主要内容是隐逸、闲适、抒情和载道,要么局限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要么担当着沉重的教化重任,忧国忧民、贴近生活的作品比较少见。元代宁波文人尽管沉沦下层,但对时事有了更高的关注度,首先是一批亡宋遗民抒发了亡国之悲愤,元代后期也有一批作家为大元的沉沦唱出了挽歌;自舒岳祥提倡写实以来,反映民生的诗文不断涌现,从而增加了元代宁波文学的生活质感;恰恰是这一类直面现实的作品,补充了历代宁波文人所缺少的某些钙质。此外,海洋题材的比重有所增加,任士林、吴莱等在这方面颇有收获。

其次是风格更加丰富多样。回顾唐代,灿烂的盛唐诗歌辉映全国之时,宁波却是文学的荒漠地带,未能分得盛唐诗歌的一杯甜羹;中唐以来,宁波诗人仍是寥若晨星,直至宋代,在理学的地域化运动推动下,宁波文人才成批涌现。因此,在元以前,宁波文学根本就是“唐风”缺席,自然更谈不上“唐风”的沉淀,基本上可说是宋体一统天下,即使晚宋兴起的江湖诗派,所学也不过是晚唐体而

已。元以前宁波诗文风格显得比较单调。元代自戴表元提倡宗唐学古以来,宁波诗文有所转型,创作者有坚持宋体的,有崇尚汉魏古体的,更多的是宗法唐人,但宗法唐人并不固定于一家一体,取法对象比较宽泛,晚唐体、长吉体、韩孟体、李商隐体、温庭筠体等都有人尝试,因此,元代宁波的诗风较之元前显然更为丰富多样。尤其是乐府歌行体,元前仅有楼钥、陈允平擅长于此,元代则作者蜂起,内容充实,艺术上也很有特色。

再次,元代宁波的作家队伍有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少数民族作家,迺贤、丁氏三兄弟即为其中之代表,甚至还有一位身为基督教教士、来自遥远的拂林的作家金元素。他们打破元代的“族群等级制”的藩篱,与甬上的士大夫、僧道通过唱酬、雅集、游宴、书画品题、谈玄论道等方式融入圈内,形成一个超越族群的社会网络。他们的相继到来,为宁波文坛输入了新鲜的血液,构成了元代后期宁波文坛的独特景观。尤其是迺贤,以其清新俊拔的诗风,打破了甬上文坛的沉闷格局,事实上成为元代后期宁波作家的最卓越代表。

元代享国时间虽不长,但宁波文学的成就斐然可观,对全国文学的影响亦不容忽视。两宋时能开一代风气,在文坛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甬籍作家只有吴文英一人,到了元代,宁波文坛出现了三大影响时代风气的杰出人物,戴表元在诗歌领域倡导宗唐得古,预示了元诗发展的历史趋势,其弟子袁桷北上,更为盛世之音的出现推波助澜。长远地看,戴表元宗唐得古的诗论,更可视作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逻辑起点;张可久在散曲领域提倡骚雅与蕴藉,在散曲词化雅化潮流中巍然成为一代宗师;寓贤高明在南戏领域以一曲《琵琶记》惊动全国,获得了“南戏中兴之祖”的美誉。

潮平海阔,风正帆悬,元代宁波文学的如许业绩,不能不述。

第一章 悲歌未彻：元代初期的宁波文坛

第一节 元初宁波的社会态势与文坛面貌

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临安降元,谢太后诏谕,“东浙诸郡,毋徒以百姓污锋镝”。元参知政事阿剌罕、左丞董文炳率高兴等追击逃入浙东的宋张世杰部,守卫宁波的南宋沿海制置使赵孟传与将作少监谢昌元,见大势已去,乃献城纳降。自此,宁波归入大元版图,至正十四年(1277)改庆元府为庆元路总管府。

但是沧桑之变,还是给地域人民尤其是宁海、奉化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元初宁波比起两宋,地域的稳定性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遭受战争的创伤度大为上升。丙子(1276)三月,元兵袭扰奉化,“剡川自更兵火,积骸满野”,时为雪窦寺住持的野翁禅师“收聚焚化,殆有万数”。^①此后,忽必烈发动对日战争,征调大批粮食、民伕,使人民不得安宁。元王朝还依仗政治势力掠夺土地,设置名目繁多的赋税,加重对人民的盘剥。为了反抗元朝的统治,宁波不断有“海贼”聚众进行小规模의攻掠,不过影响最大的还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二月宁海杨镇龙起兵反元,起义队伍发展至12万,“放兵四掠,诸县响应”。起义失败后,余部坚持战斗,但“总兵之讨贼者,多俘掠良民,敕行御台分拣之,凡为民者千六百九十五人”。^②元兵还不断搜山,骚扰人民的生活。舒岳祥、戴表元笔下的“己丑之乱”,即指杨镇龙起兵事件。元初宁波动荡的政治环境,

① 牟巘《陵阳集》卷24《野翁禅师塔铭》。

② 《元史》卷95。

为陈著、舒岳祥、戴表元等奉、宁作家提供了现实的创作素材。此后，宁波除了发生几次灾害之外，地域才渐趋安定。

但是易代之变，对汉族儒生的心理还是产生很大的影响。南宋时期，汉族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明显高涨，“是在与异民族国家政权的并立、对峙和冲突中凸现出来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与‘大一统’的国家意志或国家观念相对立。”^①但是，这种民族主义在蒙古帝国极度强大的统一意志面前很快就消散了。元代初期大多数颇有影响的亡宋知识分子都已服从了这“极度强大的统一意志”，即民族意识让位于国家观念，它最多表现为一种个体性或集团性的较为消极的思想（故国之思）或行为（拒不仕元），而不是表现为如清初那样的江南士人普遍的群体性的激烈反抗。当然，元统治者实施一些尊孔崇儒的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方士大夫的抵触情绪，南方士大夫最终还是不愿意地接受了元帝国大一统的现实。宁波的情况也是如此，元蒙军队和平地占领了宁波，像袁镛这样奋起抵抗的忠义之士极为罕见，宁波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得不务实地接受夷为中国之主的现实。诚如戴表元诗所说：“吾州兵荒来，冠盖多苟且”，现实中缺乏段干木这样的“意气”之辈。^②这样，亡宋遗民虽然怀恋前朝，但也至多发出蛸鸣之声，显得凄凉而无奈，元初的宁波遗民文学之所以缺乏抗争精神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改朝换代使汉族儒生的生存景况逐渐恶化，给江南士人的心理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奥地利精神病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在个体应付挫折情境时为了防止或减低焦虑或愧疚等精神压力所采取的一些习惯性的适应行为就是防御方式。蒙

① 张尧均《“区区著述”与“忠贞大节”——书全谢山〈宋忠臣袁公祠堂碑铭〉后》，《暨南学报》1999年第2期。

② 戴表元《剡源集》卷27《以羔裘如濡洵美且侯韵为八诗……》。

古、色目贵族飞扬跋扈，南人书生属于“四等公民”，然而就整体的文化素养而言，“南人”的文明程度恰恰高于法定的第一、二等级的蒙古、色目人。同时由于长达上百年的南北分治，南北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也拉开了某种距离。南人在元朝科举被取消之后一时在为自己的前途作出抉择时简直无所适从，内心充满了某种幻灭感。这就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得不被卷入社会性的大退避中，隐逸便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思潮，自然甬上文人大多数采取了消极退隐的防御策略，隐逸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如余姚厉元吉在宋亡后“归栖从山云，松柯荫琴史。泪挥新亭悲，诗穷黍离旨”。^①鄞县史明孙（史氏家族之后）避地逃至会稽，“每驾小艇载酒，遇佳山水即藉草而饮，酒后耳热，歌《离骚》三两章，痛哭而归”。^②也有的削发为僧，牟巘曾感叹说：“年来诗人总向僧中去。”^③戴表元进一步解释说：“盖兵乱已极，衣冠之流，铅槩之士，逃于其类而为之，非佛氏之为教或当然也。”^④如珣上人本为奉化三石陈氏儒家子，所作诗累百篇。还有一些故旧遗老，在王应麟的联络下，参加了鄞县梅墟的世纶堂集会，共抒亡国之悲恸。这些我在《汉宋宁波文学史》中多有引述，兹不详赘，读者须与前书参看，方能获得对元初宁波遗民文学的全面印象。

元代统治者为了安定江南人心，进一步加强统治，一方面将南人整体地视作社会最低等级，另一方面却有意实行征辟政策，争取一些汉族儒士的合作，来提高他们管理国家的整体水平，这对江南文人入元后的政治态度是一次考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一部分已经走向山林田园的汉族文人再次看到了入仕的希望，故而杨维

① 岑安卿《栲栳山人集》卷上《三哀诗》。

② 《光绪鄞县志》卷31。

③ 牟巘《陵阳集》卷17《跋恩上人诗》。

④ 戴表元《剡源集》卷10《珣上人删诗序》。

桢说：“宋革，当天朝收用，南士趋之者澜倒。”^①但另一些江南文人依然不改初衷，不肯以牺牲人格、节操达到迈进官场的目的。在这场考验面前，浙东文人的表现自然也各不相同。如元诏访江浙人才，魏天祐以樊伯搆（奉化人）之名上之，樊伯搆作书坚决拒绝之：

伯搆亡国之俘臣也，前者谬厕掖垣，奉职无状，退处山阿，不能保国于在朝。比及国丧，又不能死节于家居，真天地间一罪人也。……阁下乃以天命已去之谈来相劝，举不耳之论，愈足令人倍增悲悼耳。盖国家之废兴存亡固有天命，而为人臣者断违其间，殆天下之名教赖以立，后世之人心赖以正。脱谓天命之已去，而遂反颜事主，无论异日无以见我王我后于地下，即今兹亦何颜面立决于大元之朝乎？而况大元亦何藉有此二心之臣也。昔人娶妇之谕，阁下诤不闻之乎？故武王不没夷齐之义，汉高不屈四皓之高，良以人各有志，毋相夺也。今日者使俘臣虽不见用于大元，而大元惠及于俘臣，与俘臣之受知于阁下，亦已厚矣。不然，必欲如前书之言，使伯搆委质为臣，惟有如鲁仲连蹈东海以死耳。阁下其奈我何哉！

这篇书信是很有代表性的，将拒不应召的理由说得比较充分。信中以“娶妇”作比，也是遗民的普遍心态。同乡戴表元《读书有感》就有“如今已免乡人笑，老大知无欲嫁心”之句。而且樊伯搆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意志非常坚决，所以魏天祐也不能奈其何。同邑汪灏也以躬耕孝养为生，从海阴陈嵩伯讲学，知州马称德荐授衢州路学录，坚辞不赴，所著诗文结集为《蜡台稿》。

^① 杨维桢《东维子集》卷7《张北山和陶集序》。

但并非所有的文人都具樊伯揭的峻拒意志,像鄞县陈允平就比较被动一些,他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以人才被征至大都,一年后不受官放还,总算保持了民族气节,以后遁迹更深。宁海李洧孙(1243—1329)则又是另一类型,他栖迟海滨二十年,据说有终焉之志。大德二年,郡府向朝廷推荐,李洧孙名义上是被“强起”来到京师,但心里未必没有沾沾自喜之意。所以他一到京师,就述《大都赋》以献,^①“馆阁诸公咸共叹赏,交荐于上”。就这样,他在大德六年(1302)被任命为杭州路儒学教授。^②

另有一些文人,对新朝本无成见,愿意出仕为新朝效劳。如庆元人臧梦解(?—1335)宋末中进士第,未作官而国亡。至元十三(1276)年从乡郡守将内附,以敏于政事,从儒吏不断升官,大德间任江西、浙东等地肃政廉访副使。臧梦解博学洽闻,亦善为诗,今传《直沽谣》很可一读,如云:“去年吴人赴燕蓟,南风吹人浪如砥。一时输粟得官归,杀马椎牛宴闾里。今年吴儿求高迁,复祷天妃上海船。北风吹魂堕海水,始知溟渤皆墓田。”这两例正反事实的对比发人深思,看来他似乎有富贵命定的观念。此后,奉化任士林、鄞县袁桷、象山蒋汝砺均出为新朝学官。即使是故国之思较为强烈的戴表元后来也为了“以升斗自给”,被动地老作“嫁妇”,出任了信州教授。大德年间,戴表元的弟子袁桷入京,对京都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继袁桷之后又有鄞县管江人杜国英,至元二十六年(1289)创海漕时入选,授进义付尉、海运百户,乃“乘漕艘,遵神山,阅海市,观光于上京,食冰啖雪,足迹之所历,不尽不止。”他不但将一路上的旅游见闻写成诗篇,而且“出入京都余二十年,受知当路与翰林诸公,为翰墨交。”^③所著《东洲诗集》一稿,袁桷称其有“锻

① 《光绪顺天府志》卷1尚存此赋的片段。

② 黄潛《文献集》卷8《霁峰先生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8《霁峰文集序》。

③ 程端学《积斋集》卷4《元故从仕郎杭州路税课提举杜君墓志铭》。

炼之工，搜抉之巧”。^① 这批文人的创作趋向，以歌颂新朝为主，自然少有呜咽凄断之音，但他们涉足之地是宁波作家从来没有到过的，他们对于上都等地的山水风土的真切描写，开创了宁波作家的“未辟之境”。当然，这批作家的心态也很复杂，除稍为得意一些的臧梦解、袁桷之外，他们普遍地缺乏北方文士那种强烈的出世有为、建立功名的积极心态，萌生的是等级、官场的不平和不被重用的悲哀。

看来，面对元蒙贵族入主中国的事实以及统治者所实行的利诱政策，元初浙东文人的群体分化是很剧烈的，心态是复杂的，他们的政治动向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思想内涵以及地域文坛的发展走向。但不管怎么说，宁波由于世家大族众多，他们多沐浴宋恩，地位优越，入元后他们因地位骤然下跌，对前朝自然怀恋不舍，宁波俨然成为遗老的一个重要集聚地，不但本地的遗老人数众多，而且由于王应麟、黄震、戴表元等人的非常影响力，各地来甬活动的遗老也颇不少，他们创作的诗歌多有黍离麦秀之感。元初宁波文坛虽然以遗老的吟唱为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出的凄断之音与另一种粉饰之音处于此消彼张的状态。

关于元初四明遗民的诗文，《汉宋宁波文学史》已多有论及，本章则在前书未及之处，进一步揭示元初四明遗民创作的历史面貌。

第二节 宗唐得古：戴表元诗论及其时代意义

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一字曾伯，奉化人。聪明早慧，“五岁知读书，六岁知为诗，七岁知习古文。”^② 后从学于师表浙东的文学家王应麟、舒岳祥。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中进士，任建康

①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48《书杜东洲诗集后》。

② 《元史·戴表元传》。

府教授，德祐初再迁临安府。其时戴表元正在江苏狼狈避兵，有《乙亥岁毗陵道中》“狼狈今年又避兵”为证。他因切身感受到元蒙军队的步步进逼，清醒地认识到天下事已不可为，遂拒绝调任，从而使自己免于陷入或战死或投降的两难境地。入元后戴表元隐居家乡，徜徉于浙东山水，并游历杭州、宣州、湖州、严州一带，交结文坛名士，谈诗论艺。大德八年(1304)被人推荐为信州教授，时已61岁，再调婺州，终以疾辞。至大二年(1310)卒于家中。有《剡源集》30卷，其中论诗谈艺者颇多篇什。

在元代前期，戴表元是一位重要的诗人与诗论家。他的诗论多保存在为人所作的五、六十篇序中，往往是在妙趣横生的比喻中，道出有很高理论价值的诗学命题。戴表元很少是从先验的观念出发来谈抽象的道理，而是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来升华，因而读来备感亲切。戴氏诗论又具有强烈的时代针对性，那就是力矫宋季文坛的弊病，自觉地以扭转文风为己任。他曾“力言后宋百五十年理学兴而文艺绝，永嘉之学非不勤也，挈之而不至，其失也萎。江西诸贤力肆于辞，断章近语，杂然陈列，体益新而变，日多故言，浩漫者荡而倨极，援证者广而类俳谐之词。而一切真致弃坏，绳墨焚烂不可举。文不在兹，其何以垂后！”^①由此可知，戴表元对南宋文艺极致不满，道学派、江西派、永嘉四灵及其延展的江湖派均遭其鄙弃。当然，戴表元不但批判之，而且也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

首先，他痛陈理学兴而文艺绝、科举兴而诗事废，重倡以性情为诗。“洛学兴而文字坏”，此本叶适之论，可能以永嘉之学的传人舒岳祥为中介，戴表元和袁桷都接受了这一观点，并有所阐发。戴表元在《张仲实诗序》中说：“异时缙绅先生无所事诗，见有攒眉拥鼻而吟者辄靳之曰：‘是唐声也，是不足为吾学也。吾学大出之可

^①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8《戴先生墓志铭》。

以咏歌唐虞，小出之不失为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为哉？”这里所模仿的宛然是那些道学派的口吻，这应该包含有戴氏所力言的“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的意思。其弟子袁桷更明确地说：“至理学兴而诗始废，大率皆以模写宛曲为非理。”^①

科举兴而诗事废，这虽是继承舒岳祥的观点，但戴表元论述得更深切。他认为宋诗之不兴是因为有太多的利禄功名的牵累。这一方面是因为“一精词赋，则力所不能及他学”。他说：“近世汴梁诸公，既不以名取人，诗事几废。人不攻诗，不害为通儒，余犹记……为儿童时，……所见名卿大夫，十有八九出于场屋科举，其得之之道，非明经则词赋，固无有以诗进者。间有一二以诗进，谓之杂流，人不齿录。”^② 宋代科举以词赋策论取士，不像唐以诗取士，因此诗远离了功名，不再是“干世之业”。士子驰骛于场屋破碎之文以求明经词赋，随时悦俗，不肯也没有精力“刳心凋形沉埋穷伏而为诗者”。即使名成艺达之辈，得以闲暇习诗，也自以为是“不切之务”，将“吟哦成章”“私藏籍笥，不敢以传诸人。”^③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科举功名的魔力足以使诗人移易性情。他说：“昔者杭为行都，士非欲售其业者不至杭。诗虽非干世之业，而自山林攻诗者一涉足于杭而迁焉。若杭人之所自为诗，则迁逾甚。”^④ 山林攻诗之辈本无道名浊气，一旦踏入行都，就被场屋的潮流所裹胁而迁移了性情，而一旦注入了功名的废液，诗也就变成毫无生气之具了。只有科举废后，人们才能摆脱俗态，“放意于诗，不复如前却行顾忌”，^⑤ 于是“诗事渐出”。也就是说易代之后科举制的废除已自然地消除了对诗坛的压力，才赢得了诗的繁荣。戴氏关于科举与

①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1《乐侍郎诗集序》。

②③ 戴表元《剡源集》卷9《陈晦父诗序》。

④ 戴表元《剡源集》卷8《白廷玉诗序》。

⑤ 戴表元《剡源集》卷8《张君信诗序》。